

# 沟 通

——访美讲学论中西比较文学

孙 景 尧 著

广西人民出版社

# 沟 通

——访美讲学论中西比较文学

孙景尧 著



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南宁市河堤路14号)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民族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9.5 印张 285 千字

1991年5月第1版 1991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850 册

ISBN 7-219-01839-8/I·515 定价：4.35 元

## 序

景尧同志这次从广西讲学回来路经上海时对我说，广西人民出版社已经决定将他的新著——《沟通》列入1990年度出版计划，它有了婆家了。我听了不禁合掌相庆，把它看成一个特大喜讯。因为在当前这个知识贬值的尴尬时代，文化出版已日益陷于低谷状态，在经济大潮的冲击下，孔子在2000多年前说的那种“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的社会现象，仍然是今天生活现实的生动写照，而我国知识分子，尤其是八十年代以来崛起的新一代中青年知识分子、学人，仍然能安于清贫和寂寞，勤于舌耕和笔耕，为我们民族的文化建设和积累，为人民素质的提高和改造，积极地作出自己的贡献。可以说，他们继承和发扬了我国传统知识分子那种“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优良传统和学风，那种硬骨头精神。同时，我们还有一些值得尊敬的出版家，不为“铜钱眼里翻斤斗”的市侩积习所左右，仍然保持了坚定的事业心和清醒的历史责任感，忠于自己的出版职守。这两种相辅相成的精神境界，确实使人高兴和鼓舞，值得称赞和表扬，因为它显示了我们这个社会健康的有生力量。这真是“人还在，心不死”，实在好得很！

比较文学作为一个学科，在我国重新崛起，说来也有十多个年头了。总的说来，它无论在科研、教学、出版和与国际交流等方面，都取得了可观的成绩。它已由早期的单纯介绍国际比较文学的理论、历史、流派、方法与发展态势的做法和浅层的探索中外作家影响关系的研究，逐渐进入了更深层次的研究领域。在实践中，为建设“中国学派”走出自己的道路，许多学人确实是“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而景尧同志在这方面所作的努力与貢

献，尤其引人注目，因为他始终站在这个学科建设的先进行列。众所周知，他与卢康华同志合著的《比较文学导论》，是我国第一部比较文学理论著作，也可以说是一部启蒙性读物。因此，它不仅受到国内学术界和读书界的好评，被大专院校普遍地采用为专业教材，听说去年又有了维吾尔语译本，而且也引起国际比较文学同行的注目和好评，被认为是中国比较文学复兴的征兆。今天看来，它在我们这个学科的建设中，可以说实在起了一个良好的带头作用和开拓性的学术效果。

正象比较文学本身是一个开放性的学科，发展中的学科，也是一个世界性的学科一样，景尧同志这些年来，在我国开放性的文化环境中，又通过多次参加国际性的比较文学学术会议和外出讲学、与国外同行专家的交流与交谊、为国外专业杂志撰写论文、主持《文贝》(Cowrie)这个用英文出版的中国比较文学研究杂志等多种方式，始终把自己的专业研究和教学放在学科的世界大的学术背景下来认识和要求自己，努力保持了与这个学科的世界性发展水平同步前进的步伐。因此，继《比较文学导论》之后，他又于1987年编译出版了《新概念、新方法、新探索》这部精选的介绍西方当代比较文学研究新的学术成果的论文集。还为青年读者撰写了《简明比较文学》一书，又同乐黛云教授等人合著了《中西比较文学教程》这本教材。而眼下这部即将付印的《沟通——访美讲学论中西比较文学研究》，则是他多年研究或发表在中外刊物上的论文，有些还是初次见于铅排的文字；也是他1987—1988年应聘到美国当访问教授，向外国学生讲授《中西比较文学研究》课程的讲稿集。它内容广博，诸如对照马列所论比较研究，对中国比较文学理论基础的探讨，对国际学术界流行观点的质疑与商榷，对中国比较文学历史的钩沉与论证，对中西比较文学研究方法的探索与总结，对钱钟书所著《管锥篇》学术贡献的阐述及其学习要领的提示，以及对中西文化与宗教同中西比较文学关系的透视，

对中西诗歌、小说、戏剧的浅层与深层意识的纵横辨析，对文学史体系的反思与考辨等等，都反映了作者开阔的学术视野，跨越中外文化、文学的扎实的知识素养。因此，每篇都有开拓、有新意、有创见，每篇都能瞄准国际学术所达到的最新发展水平的高度进行思考和论证。尤其值得注目的是，作者在治学的态度和方法上，始终能立足于中国的传统与现实，在广大的世界学术框架中，对西方兴起的各种文化、文学思潮、理论和方法，进行合理的摄取和引入。既不盲目吹捧，又不随声附和，更不是一个盲目排外的国粹主义者，或民族沙文主义者。作者能以清醒的头脑和当代意识，从今天的时代高度上来审视、分析传统和外来的文化和文学现象，有所摄取，有所扬弃，有所改造，有所融会。这种严谨求实的创造性学风，尤其难能可贵。因之，本书作为一家之言，能自成其体系，不仅具有很强的学术性和一定的学术价值，对比较文学界有其重要参考意义，对于广泛的研究中外文化、文学及历史与社会的学者，也具有一定的阅读价值。

我已进入人生暮境，但每每看到在新的开放性文化大环境下，我们新崛起的中青年两代学者，能甘于淡泊和寂寞，不断地在学术建设上捧出新的研究成果，往往喜不自胜，感到无比的兴奋与慰藉。因此，在景尧这部新著即将出版之际，我愿藉这篇称为序的小文，把它推荐给我们的读者及社会。

贾植芳

1990年1月25日，上海

# 目 录

序.....	贾桂芳(1)
<b>第一章 中西比较文学研究的理论基础探.....</b>	(1)
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活力.....	(2)
二、马克思主义的比较文学观.....	(8)
三、马克思主义的比较研究方法探.....	(14)
<b>第二章 中国古代比较文学研究的渊源探.....</b>	(25)
一、辨析.....	(26)
二、“格义”.....	(34)
三、“贬误”.....	(41)
四、“况义”.....	(47)
<b>第三章 当代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特点探.....</b>	(56)
一、近代风尚.....	(58)
二、开山之作.....	(69)
三、趋向成熟.....	(76)
<b>第四章 “危机”和“复兴”探.....</b>	(90)
一、对比较文学始于十九世纪的质疑.....	(91)
二、十字路口上的当今西方比较文学发展.....	(98)
三、中西比较文学研究方法探.....	(111)
四、为“中国学派”一辩.....	(118)
<b>第五章 中西文学的相互交往探.....</b>	(131)

一、欧洲文学的发展和中国的影响	(131)
二、中国文学的发展与外国的影响	(144)
三、原动力的流向与结果之一	(158)
四、真赝同“时好”——首部中国文学史辨	(170)
<b>第六章 中西文学的文类与文体探</b>	<b>(191)</b>
一、西方的“文类”	(191)
二、中国的“文体”	(201)
三、文体与文类辨	(210)
<b>第七章 中西文学的沟通方式探</b>	<b>(221)</b>
一、诗的同异	(222)
二、中西间“对话”	(236)
之一：中美学生课堂研讨课纪要	(236)
之二：关于美国学生不懂一段古文的教学笔记	(240)
三、错位与补位	(242)
<b>附录：①《老子》中“道”的比喻系统(简小滨)</b>	<b>(258)</b>
一、比喻和比喻系统	(259)
二、《老子》中“道”的比喻系统	(269)
三、两点初步结论	(276)
<b>附录：②说书人的审美观与“宋四公”(马克·本德)</b>	<b>(286)</b>

# 第一章

## 中西比较文学研究的理论基础探

人分男女老幼，又有蒙古人种、尼格罗人种、欧罗巴人种之别，也有黑、白、黄、棕等肤色之异，人还有热情、冷漠、外露、内向、忠厚、奸诈、诚实、虚伪、俊美、丑陋、风流、拘谨等多种差别，但作为“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sup>①</sup>的人，他总是有意识的社会性高级生物。

人，到了诗人与小说家笔下，则更是千姿百态、绚丽多彩，既能催人潸然泪下，又能令人大笑捧腹，但作为人大脑中所反映出的一定社会现实的产物——文学，它却总是属于一种社会意识形态。

作为文学研究学科之一的比较文学，纵然它的视野遍及古今中外文学，它的触角伸及纵深内外的各个层面与学科，然而，由有意识的研究者去探索属于意识形态的被研究对象，它的一切理论与方法论，包括其立场、观点、视角、方法等等，无疑都受制于一定的指导思想与理论基础。

因此，当我们着手进行中西文学比较研究之时，自然也应首先明确我们研究所赖以存在的理论基础问题。对此，我颇为欣赏美国当代文论家何纳迪教授的这句话：“只有用更多的、假定更好的理论，才能在文学理论化方面整理我们今天感觉到的错误或种

---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8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

种极端之处。”①为此，我们不妨也试作一个极为简略的回顾，并把其分成三个部分，来认识我们对中西比较文学理论基础的看法。即：

为什么要以马克思主义来作为中西比较文学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对比较文学研究理论的指导意义是什么？马克思主义对比较文学研究方法论的启示有哪些？

## 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活力

在西方，对比较文学的研究，开始很早，但一直未能摆脱所谓的“比较文学的危机”。众所周知，以究渊源、查媒介与重考证等“经过路线”为其主要特点的法国影响研究学派，曾对比较文学这门学科的形成与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由于它的理论基础与指导原则是达尔文的进化论，浪漫主义文论，以及丹纳的“种族、环境、时代三要素”论和孔德的实证主义论，因此，使他们“压上十九世纪事实主义、唯科学主义和历史相对主义的重荷”，背上了“陈旧过时的方法论包袱”；而一味拘泥于狭隘的有直接隶属关系的两国文学间的比较，又使之变成对两国文学间“外贸关系”的研究，而陷入了“比较文学的危机”。②

二次世界大战后崛起的美国平行研究学派，反对把比较文学局限于有直接影响关系的两国或两国以上的文学间的实证分析，主张把文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联系起来探讨。这使他们为这一学

① 孙景尧选编：《新概念、新方法、新探索》，漓江出版社，1987年，第50页。

② [美] René wellek, The Crisis i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Concepts of Criticism, ed, S.G. Niecholes, Ir Nen Haven, 1963.

科拓开了研究的领域，突出了比较文学的美学分析这一文艺学的固有特性，从而使这一学科更趋成熟与发展。但是，由于他们的理论原则是精神分析心理学、语言结构主义、唯美主义等现代派理论；因此其固有的唯心主义、神秘主义与形而上学等痼疾，使之“原想包罗一切，结果却会什么价值也没有”，而最终也未能克服“危机”。①

于是，他们转而寄希望于东方，希望“中国——这位姗姗来迟者”，能“努力探索一套东方的研究方法来取代西方——一个纯‘中国’的比较文学学派。”②

一些颇有远见的西方比较文学家与港台的比较文学学者，也从六十年代末开始，着手进行创建“中国学派”的努力。然而，他们依循故辙，仍套用西方旧论，用他们的话来说：“我们不妨大胆宣言说，这援用西方文学理论与方法并加以考验、调整以用之于中国文学的研究，是比较文学中的中国派。”③因此，尽管他们开拓了传统的中国文学研究领域，也产生了不少中外文学关系的新见，然而，他们以中外文学的研究来为上述理论添注新解，依然缺乏自己的特点与理论创见，而最终未能摆脱上述“危机”，建立崭新的“中国学派”。

这就再清楚不过地告诉我们，西方比较文学的理论原则，是决不能克服“比较文学的危机”的；即便创建“中国学派”和发展中西比较文学，也同样不能盲从上述那些理论基础。而应象欣欣向荣的我国学术事业一样，仍然应当回到马克思主义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基础上来。

① [法]弗·基亚著，王坚良译：《比较文学》，《文艺理论研究》1982年第8期。

② [美]李达三著：《比较文学研究之新方向》第161页，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8年。

③ 古添洪、陈慧桦编著：《比较文学的垦拓在台湾》，东大图书公司，1976年，第2页。

其次，对“比较”这一比较文学用以命名的方法特征，也同样如此。诚然，“比较”是古已有之的方法，或如写了第一部比较文学专著的英国学者波斯奈特教授所说：“用比较法来获得知识或者交流知识，这种方法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和思维本身的历史同样悠久。”但是，作为比较文学研究中所用的“比较”，则是这一研究的起点，并又贯穿在整个研究的过程中，因此它不再是一种自发的比较，而是一种“有意识的比较”，“总的目的、重点和方法上必须是比较性的。”<sup>①</sup>这种自觉的比较，它既是比较文学研究应有的准备，又是实施的保证。

在这方面，西方的比较文学家们虽然十分关注，但却又常常感叹：“未能确定明确的研究内容和专门的方法论。”（韦勒克《比较文学的危机》）德国的霍·吕迪格也认为：“特别的任务和方法并没有使比较文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其实，责怪比较文学方法论本身是不公平的。众所周知，自古希腊的柏拉图与中国古代的孔子起，人们就在文学研究中自觉或不自觉地在运用着它。因此，问题的关键不在比较方法的本身，而在运用它时所赖以进行的立场、观点与修养等方面是否对头和自觉。应当承认，“一切的价值都在比较上看出来”，就是对比较文学的方法论，也应当如此。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中国进行民主革命，“一切别的东西都试过了，都失败了”，唯有“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中国的面目就起了变化了。”同样，要建立与发展中外比较文学，在方法论上也应当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理论宝库——这个“从全部人类知识中产生出来的典范”——去汲取营养并作为指南。

事实上，即使是在西方文论界，也不例外。如西方文论家阿伯拉姆斯所说，马克思主义“在最近五十年中也一直在不断创新

<sup>①</sup> [美]雷马克：“比较文学的定义和功能”，《比较文学研究译文集》，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第219页。

与伸展扩充着。”①卢卡契、本杰明、阿道诺、布莱希特等“西方马克思主义”固不必说，就是其他重要的西方当代文论，无论是已经过时的存在主义，还是正在盛行的结构主义——解构主义、或是接受理论和新价值论，都莫不受到马克思主义的侵淫。这一切，诚如国际比较文学耆宿雷马克所说：“最有趣、最富有创造性的要算马克思主义对西方文学界所产生的影响了。”②当然，他们运用马克思主义各有意图与重点，同我们不尽相同也无法相同，但这一切均说明，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我们进行中西比较文学的理论基础，是完全可能也完全可行的。

这是因为：

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是人类智慧的高度结晶，是我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最强有力的武器。正如列宁在《青年团的任务》一文中所说：“马克思主义就是共产主义从全部人类知识中产生出来的典范。”“凡是人类思想所建树的一切，他都重新探讨过，批判过，根据工人运动的实践一一检验过。”经过一百多年历史进程的验证，充分显示了它确实是“典范”，确实是指导我们一切工作的科学的理论原则。而这正是西方比较文学学者所讳莫如深的。显而易见的是，在比较文学研究中，无论其方法、任务或目的等有多么特殊，但它同一切学科一样，也始终有个标准问题，有个划分类型确认对象以及如何透过现象求得本质与规律的问题。而这些只有运用唯物辩证观与历史唯物观，才能办到，才能不致于象西方比较文学研究那样，虽然发现了许多同异，也探求到一些规律，但最终还是堕入唯心主义、相对主义、唯美主义、结构主义、实证主义等等“泥潭”。英国的资产阶级

① [美]阿伯拉姆斯：《文学术语辞典》，纽约，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1988年，第201页。

② 孙景亮选编：《新概念、新方法、新探索》，漓江出版社，1987年，第102页。

文艺理论家柏拉威尔说过：“文学可以被那些并非以文艺批评专业和首先不是文艺批评家的伟大人物加以‘运用的方式’。”①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正是这种最“伟大人物”。

诚然，马克思、恩格斯不是文艺批评家，也没有撰写过文艺学或比较文学的专门理论著作，然而他们却都是具有极深的世界文学造诣的伟人。而且在他们卷帙浩瀚的著作中，几乎涉及了文艺学的一切领域，揭示了文学的主要规律，尤其是有关文艺的论述，更成了人类文论史上的一座丰碑。

在马克思的著作中，他引用世界伟大作家词句的得心应手的程度，他对作家作品的精辟评述，足证其文学造诣之深。即使是在《共产党宣言》、《资本论》这类论著中，也洋溢着文艺学的特有的美学性与修辞性的感人魅力，使西方学者S·E·海曼无比叹服，说它“几乎是革命修辞学的一部选集”。②

马克思几乎论及了上自古希腊、下迄他那个时代的欧洲各国的重要作家。柏拉威尔在读了马克思的全部著作后，深深感叹道：

“马克思的头脑正是许多世纪和许多国家的文学经验和回忆的一个宝库。”③

马克思主义完整的文艺思想体系，是客观存在的。对此人们已作出了许多论述，甚至连西方资产阶级学者也不得不承认。当代比较文学权威、著名的美国文艺批评家韦勒克也认为，“马克思关于文学的散见各处的评论，即使谈不上是完整的文学理论，但

---

① [英]柏拉威尔著，梅绍武等译：《马克思和世界文学》第1页，三联书店，1980年。

② 见S·E·海曼《缠结的组合，富有想象力的作家达尔文、马克思、佛拉采尔和弗洛伊德》，第100页，纽约，1966年；转引自《马克思和世界文学》译者序第5页。

③ [英]柏拉威尔著，梅绍武等译：《马克思和世界文学》第220页，三联书店，1980年。

是却不乏连贯性，而且是由一种总的历史哲学连结在一起的。①

马克思自己就对保尔·拉法格说过：“我是一个世界公民。”②也就是说：这位伟大的“世界公民”和他的亲密战友恩格斯，在他们的著作中，是从“世界公民”的角度，通过对“世界文学”的比较研究，而提出了一系列的、并包括了比较文学在内的文艺学重要理论的。

恩格斯在给明娜·考茨基的信中，将古希腊悲剧同但丁与席勒的作品比较分析后，提出了“倾向”应“让它自己从场面和情节中流露出来”的主张，以及文学应有“倾向性”的要求。③

恩格斯在给哈克奈斯的信中，将巴尔扎克同“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一切左拉”，以及同哈克奈斯的《城市姑娘》比较，又提出了“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这一现实主义创作原则。④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将希腊艺术同当时的文学比较，又用莎士比亚同当时的作家作品比较，从而得出了“物质生产的发展对于艺术生产的发展不平衡关系”的著名结论。⑤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合作的《德意志思想体系》一文中，通过“把拉斐尔跟列奥纳多·达·芬奇和提威安诺比较一下”，而提出了“社会组织和分工状况制约着”艺术成就的正确认识。⑥

这样的例子，还可以列出很多。如要求“内容与形式的统一”，要求文学研究成为“人类科学”的一部分，要求“艺术摆

① 见[美]Rene Wellek, *A History of Modern Criticism: 1750—1950*, New Haven, 1955.

② 《回忆马克思、恩格斯》，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69页。

③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382—386页。

④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61—463页。

⑤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11—114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第1卷，第335页。

脱宗教桎梏”，民歌应当“反映群众情绪”等等，都是通过“世界文学”，即我们现在所说的对不同国家的文学艺术所作的比较研究而得出的。因此，马克思主义不仅从根本的认识论上，也不仅从文艺学的普遍原则，而且还从具体的比较文学学科的特有的原则上，都给我们研究比较文学指出了所应遵循的方法指南与理论基础。

## 二、马克思主义的比较文学观

我们还应当特别强调指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比较文学的有关论述，是自有其明显的马克思主义的比较文学观的。

所谓马克思主义的比较文学观，也就是他们对比较文学研究的基本观点与态度。我们从他们的著作中可以发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一向很重视比较研究，并对比较文学表示了极大的关注和“兴趣”。他们在论述中，从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出发，对比较研究与比较文学，从哲学的高度作了科学的回答。

在标志着马克思、恩格斯已经成为成熟的共产主义者的名著《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马克思与恩格斯对德国当时反对比较研究的谬论，进行了有力的驳斥，明显地表示了自己的态度：

“一些大民族——法国人、北美洲人、英国人——不论在实践方面和理论方面，在竞争方面和科学方面，都是经常互助比较的。象德国人一样的害怕比较和竞争的小商人和市侩，总是躲在他们的哲学商标制造家们给他们制造了不可比较这个盾牌后面。”①

就在这篇论著中，马克思、恩格斯对比较研究的运用，从正

---

① 《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第1卷，第292页。

面肯定了它是有“普遍意义的”。也就是说，应当运用到一切科学中去。他说：“他当然完全不懂得比较解剖学、植物学、语言学等这样的一些科学，这些科学仅仅由于在可比较的对象的范围内，比较和确立差别就取得了巨大成就，在这些科学中比较是具有普遍意义的。”①

从马克思、恩格斯身体力行地对古希腊文学与近代文学之比较，对莎士比亚与席勒、对拉斐尔和歌德、达·芬奇、铁相等作家、作品与文艺思潮的比较研究，就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到他们对比较文学的认真态度及积极提倡。1865年7月15日，恩格斯在给马克思的信中说：“我正研究格林的童话、日耳曼的英雄传说和古代弗里斯兰的法律等等。我只把这些东西涉猎一遍，我还要认真研究一下古代挪威的语言。……我看这样附带地研究是No use（无用的），等工作少了一点的时候，我一定要以大约四个星期的时间来专门做这件事情。”②

值得一提的是，1868年12月13日，恩格斯在给马克思的信中就表示了他对中外文化比较的兴趣：“在迈耶尔的来信中，把波希米亚人和中国人加以对比，使我觉得很有趣。”③

不仅如此，就是对别人所进行的比较研究，马克思也表示了极大的关注。1869年8月10日，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特地抄录了丹尼尔·笛福（《鲁滨逊漂流记》的作者）两段比较的英文原文，并说：“也许会使你发生兴趣。”④

可见，马克思、恩格斯对比较研究的提倡、兴趣与关注，以及他们众多的比较文学论断，都是有普遍意义的。它既是马克思

① 《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第1卷，第291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第2卷，第69页。

③ 同上注第253页，迈耶尔（1840—1872），德国社会主义者，第一国际成员。1867年住在美国，是美国工人运动的积极参加者，纽约德国工人总同盟的创立者之一。

④ 同上注第194页。

主义文艺学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又是马克思主义为我们提供的研究方法。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比较研究与比较文学研究的一个最显著的特点：就是闪烁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光辉。

马克思、恩格斯在进行不同国家的文学之间的比较研究时，都十分注意从经济基础出发来研究文学和文化。“只要知道某一民族使用什么金属——铜、银或铁——制造自己的武器、用具和装饰品。就可以臆断地确定它的文化水平。”<sup>①</sup>

这一原则是他们在研究不同国家文学间的影响关系时，无论是渊源学还是流传学或是媒介学，都始终坚持的。如在谈到渊源关系时指出：“丹麦从德国获得全部文学资料，正是获得物质资料一样，因此，丹麦文学（除了霍尔堡以外）实际上是德国文学拙劣的翻版。”<sup>②</sup>反之，当谈到流传学时也认为：“在这种作品从法国搬到德国的时候，法国的生活条件却没有同时搬过去。在德国的条件下，法国的文献完全失去直接的意义，变成了纯粹著作界的一个流派。它必然表现为一种关于现实人性的无谓冥想。”<sup>③</sup>

而他们在对许多并非有影响关系的不同国家的作家、作品与文学运动之间的平行比较研究中，坚持唯物辩证法与历史唯物观则更为突出。对人类早期文学的研究，他们认为：“在历史发展的最初阶段上曾经每天都有新的发明，而且每一地方与其他各个地方毫无关系。”这对上古文学的平行研究，从根本上阐明了其内在联系。

而对后来的丰富复杂、纷繁多样的文学，也同样如此。恩格斯指出：“单是《风流娘儿们》的第一幕就比全部德国文学包含着更多的生活气息和现实性。单是那个兰斯和他的狗克来勃就比全部

---

① 《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第1卷，第137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第463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第3卷，第113页。